

■ 学人素描

邱东：吃透国情再论中国经济是非



◎ 倪小林

引起我采访邱东愿望的是他对统计学一个精彩的断言：统计使人豁达！这些年来，百姓们对统计数字已越来越关注。尽管我国的统计数字和统计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但人们还是对统计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邱东作为我国知名的统计学专家，见到他话题自然就从这里开始了。

人生感悟：“统计使人豁达”

邱东在东北财大当过六年校长，我走进他现任就职的中央财经大学办公室，第一眼看见他就是一派东北人的豪爽，这一点我在电话里和他约访时已经有了预感，而他爽朗的笑声和直率的言谈，更印证了我的直觉。

你对我那六个字感兴趣？“邱东请我坐下就直接进入了统计与人生的话题。邱东告诉我，恢复高考后他进大学读的是计划统计，那时的专业很难凭兴趣选择，有个书念就不错了，尽管如此，他这一生还是和统计学结下了不浅的缘分。走上教育管理岗位之后，他能够从更加宏观层面来看待统计学，加上如今统计又和人们的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他就对这门学科的社会学、哲学意义更感兴趣了。

作为中央财经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以为他能够抽出点时间继续搞专业研究，继续笔耕已经不容易，再加上他还在不少学术机构兼任职务，能够保持对于专业研究和世事的敏锐就更加不易了。

这大概与他独特的看问题方式有关，用他的“豁达”观来说，就是良好的统计训练使人宏观意识比较强。谁都知道，总体和总量是统计学中最基本的概念。统计总是把着眼点放在宏观大趋势的把握上，对个体数据如何处理，也取决于怎样科学地得到对总体的认识。久而久之，统计的训练使人的宏观意识得到强化，遇到问题习惯将之放在时空的大背景中去考虑。

文如其人，只是对邱东的初步印象，而面对面的交谈，才让我明白，邱东的统计豁达观实质上也是他对人生的一种思想态度。邱东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引用了一段培根的经典语言：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智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基于对于人生的实际感悟，邱东加上了一句：统计使人豁达。”

■ 来自日内瓦

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否拖累美国经济

◎ 徐千惠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开始关注美国经济增长是否会减速问题，一旦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势必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由于宏观经济景气度与股市波动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联系，当今美国经济出现的任何问题会透过影响中国经济，又会对中国股市的波动趋势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是否减缓？对此，美国市场分析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经济出现了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现象，以及次贷危机的冲击与影响将继续存在，因而担忧美国经济会出现减速甚至衰退，并陷入泡沫破灭和经济危机。另一种颇为乐观，认为虽然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减速，但距离衰退仍有一定距离，因为目前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依然良好，预示了美国经济增速不会放缓。

邱东是我国知名的统计学专家，曾任东北财大校长，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他对统计学的深刻感悟是“统计使人豁达”，让人看到了统计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

他为我国教育事业多次建言，反映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他以“吃透国情”作为学术研究原则，反映了他严谨和务实的学风。

谈话之中，我们扯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读书，我没想到这位大学里的书记，还对畅销书颇为关注，说起孔子热和国学热他自有一番道理，对于时下流行的说史方法，他还从经济学的角度给予了宽容的解释。

此刻，我理解了邱东能够把枯燥的统计学问题升华到人生的哲学思索，正由于他以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应该兼收并蓄，这样才能把灰色的理论和鲜活的现实粘合得更为精彩。

为教育改革多建言是一份责任

“一年365天，每一天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含义，对一些人很普通的日子，对另外一些人却会是特别的。2004年4月8日，中国市场调查业协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我想，这一天对中国民间统计来说，是个大日子。”这是邱东在新华网的博客里写下的一段话。

他看准这一天的纪念意义，是着眼于我国的统计系统，有一个与官方统计系统并存的民间统计系统，会促使统计数据更加完善和全面。邱东总是以开放的思维去看社会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教育改革上，他既尽本责，又坚守一个公民对社会进步应有的那份责任。邱东是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的专家，身在教育事业之中，他的心思和心血当然主要还是花在教书育人和教育改革上。

在2003年的人代会上，他接受了一次记者的采访，谈到如何看待这些年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大家都知道，中国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历史性跨越阶段的转变，但人们或许还不知道的是，这是在时间短、投入少，且没有出现大学潮的格局下完成的，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界是相当艰辛的，中央政府也是非常重视的，全社会也是投入了不少，所以不能“枉自菲薄”，只渲染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这里还得注意建言者的立场，正是教育的大发展，使得每一位公民都成了与教育息息相关的人，你才会这么关注教育，你已经不再是局外人，因此不宜讲你们教育如何如何，而应该讲我们教育如何如何。

邱东认为，现在对高校要求太多，而且有的还是两头堵，让高校莫衷一是。到底是追求学生毕业时的就业

率还是更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到底是铸造“器”还是成就“材”？是让学生一毕业就起飞还是培养他们的空中加油能力？对学生本人、对家长、对学校和对社会而言，这是一个长期与短期存在的矛盾，并且还十分尖锐。

邱东很直率地提出，不能用过去精英教育下的就业观念来套裁大众化教育下的就业现实。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多数大学生只是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尽管系统的学习可以使人有机会上升到更高层次，但也只是机会，并不是一份保险，而且学习总是要有机会成本的，要想有更多产出就要先有投入，产出只是一个预期而已，但投入却是实实在在的。从这一点看，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是应当由全社会共同思考，这个问题确定了，才好确定办什么样的教育。教育自有教育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教育需要更多的关心和支持，而不是指责和干涉。邱东对当时提出的“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言改为“办让人民满意度不断提高的教育”，增加“不断”二字就是要把教育纳入到一个历史过程中去看待。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真正把教育当作事业来做的人，是如何在现实的困难中前行的。这些年来，中央财经大学的确也培养了不少国家有用的人才，这与那些献身教育的人们所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吃透国情：是我研究问题基础

虽为教育工作者，但邱东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尽可能不失一名学者的义务。在今年两会期间，他接受了新华网采访，以一个经济统计专家的眼光对国际上大肆渲染我国资源消耗方面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的资源消耗从总量上讲可能是挺吓人的，比如说“中国消耗了世界40%的水泥”等等，其实细究起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过分地自责：其一，中国人口多，如果从人均量数据来比较，中国人均资源消费在世界上的水平并不高，跟很多发达国家比反而是低的；其二，中国当前正处于资源需求量大较大的历史阶段，过了这段资源压力阶段后就会减轻；其三，中国处于世界生产链的低端，消耗许多资源是为了生产出口产品，我们的名义资源消耗量大大超出了实际资源消耗量；其四，中国资源利用效率正在迅速提高。

目前购买二手房，银行普遍会要求首付比例提升到六成以上。因而，美国各大银行针对房贷所采取的紧缩性措施，让市场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前景普遍感到忧虑，进而担忧当前美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出现放缓。

由于目前美国仍是中国的出口大国，净出口增长又是支撑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良好，但如果一旦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角度分析，一旦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这也会影响到中国股市的波动趋势。

当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投资市场（包括股市）之间的联动性进一步增强时，关注美国经济走势，包括次贷危机影响及美元贬值趋势是否继续等，这都将有助于中国的投资者认识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股市影响等，进而把握住投资的机会。

为此，邱东提出了“资源消耗层级论”的理论观点，希望国人和世人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中能冷静地面对和判断中国的资源问题，从而能更理性地节能和减排。

要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一定要吃透国情。邱东这些年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一直本着这个原则。

2005年初，邱东把十多年来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集结出版，名字叫《经济主体归位与地区可持续发展》，其中有“三论”是他原创的观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论是“政策位差资源论”。邱东认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客观现实，如何因势利导就成了宏观调控的一个重大课题，水资源要成为水力资源或水利资源，得人为地改变水位的落差，其实经济政策本身也是一种潜在的无形资源，要让这种软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也要采取对待物质资源类似的方法，形成政策的位差，以造成发展更大的势能和动力，让潜在的资源显化。通常我们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但这需要在理论上得到升华，我们在实践中还得注意走出误区，不能被不同利益主体的争闹所干扰，避免再次掉进“低效平衡陷阱”。

二论是“经济主体归位论”。现代市场经济是由居民、企业、政府和“非

常住单位”四大经济主体构成和运行的，他认为，原有体制是在经济主体错位的状态下运行的，政府严重越位，而其它主体则严重缺位，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这些主体逐渐归位的过程，这需要较长的历史时期，其中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二是主体能力的恢复和再造，在新体制构建和实行中，利益驱动应该是管理和调节的主要方式。

三论是“可持续发展层次论”。邱东从资源稀缺、公共的悲剧和代际公平几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内在矛盾，还用智猪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偏好，进而提出一种分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现实思路，通过“正外部效益受益”来逐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事实上，总体的可持续发展并不绝对排斥局部的不可持续发展，因而可以对不同层次国家提出“恶化减缓型发展”和“可扩展型发展”等不同要求，如果各类国家没有明确的责任分配，可持续发展基本上就是被束之高阁。

我仔细阅读了他的这几篇代表作，深感一个学者要能够学贯中西，有发展、创造性地思考和建言，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立足国情，吃透国情。

■ 本期人物话语



防止通胀和经济过热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

马凯(国家发改委主任)在12月7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说，要切实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 多声道

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世界影响日益增强

陈光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经济区域化与全球化发展步伐加快，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发展。这不仅对其自身有益，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整体贡献也愈来愈大。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其经济本身也存在一些弱点。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必要实现经济多元化。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加强金融监管，确保经济健康稳步发展。新兴市场经济体今后更加注重金融体制的完善与监管，注意开放的速度。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还应避免资金流动过大造成金融市场震荡。

经济形势趋于过热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12月4日表示，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趋于过热，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对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继续贯彻稳健的财政政策，同时财政政策要加大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要求实际上的增收转变为从紧，要通过宏观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协调，或深化改革，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要把防止经济增长偏快转为经济过热，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日本金融系统能消化次贷危机

福井俊彦(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行长)12月3日在日本名古屋发表演讲时说，次贷危机不会对日本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影响。次贷危机对日本金融机构的冲击相对较小。从目前来看，日本金融机构普遍能够消化与此相关的损失。因此，次贷危机将不会严重影响日本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同时日本经济前景依然乐观。但是，如果美国或欧洲经济恶化的风险真正出现，世界经济也将可能恶化。

外国政府将可发人民币债券

谢旭人(中国财政部部长)在12月1日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说，中方在促进国内债券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一直致力于推进国内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2005年中国对国际开发机构开放了人民币债券的发行。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积极研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问题，以便在适当时机引入外国政府这种全新的发债主体。在清迈倡议的框架下，中方与日方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在2002年3月签署了金额为30亿美元的本币互换协议。今年9月，双方又续签了互换协议。中方愿意继续与日方加强在清迈倡议下的沟通与协作。在发展亚洲债券市场问题上，中国认为仍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并可在此基础上，选择一些区域成员共同关注、且具有现实政策意义的重大问题加以突破，从而带动区域债券市场的整体发展。

■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中国实践：丰富发展经济学理论

◎ 梁怡

任何一套理论范式的建立都需要历经多年的积累与提炼，一套具有普适意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尤为如此。如果断言发展经济学的中国范式已然形成虽过于草率或着急，但经过五十多年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经济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不仅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也已初具了一种中国式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这一说法或许并不夸张。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在最初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出现一系列问题，如城乡差别的扩大、失业加剧、农业发展受损和市场机制被忽视等。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对既有的工业化理论进行反思，学者们逐渐达成一种共识：须重新定位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且要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进入80年代，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学者们通过历史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把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了影响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例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波金斯和罗歇·斯诺德格拉斯从贸易和工业化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工业化战略，由此推进和深化了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更趋深化，这尤以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桑加·拉尔的研 究为代表。依据激励有效性假设，他把贸易战略作为工业化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认为成功的工业化在短期内容意味着物质能力的增加或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这种能力的建立与利用是有效的；国家层次上的工业化成就与激励密切相关，同时还取决于国家层次上的能力与制度，即国家层次上的工业化成就是由激励、制度与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斯特纳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环境政策选择上以税收作为工具来解决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表明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研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重视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来研究工业化问题。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和产业制度变革为特征的发展过程。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总体上已前进到中期阶段，尽管各地区之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但它注定了中国要走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持续发展及重视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等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今中国工业化道路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合理选择，尽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从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中吸取精华，又反思了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传统工业化战略，但主要是受到了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影响，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当今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这一点尤为值得关注。